

## 專題引言

在東亞文化交流史中，文本的開放性、概念的游移性以及人物的主體性，常常是構成萬花筒般的文化交流現象的三大元素。本期從已經通過審查程序的來稿中，選取主題可以互相發明的三篇論文，共構成爲「東亞視域的交錯」專號。本期三篇專號論文，各從不同角度，闡釋東亞文化交流中文本（《易經》）的開放性、概念（「日本」）的游移性與人物（藤原惺窩）從自己國家（日本）的主體性所展開的對明朝、朝鮮與安南的視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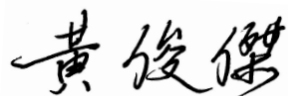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篇論文是吳偉明教授所撰，概述《易經》在近世琉球的流傳。《易經》這部經典內涵廣大悉備，二十世紀港臺新儒家的精神導師熊十力（1885-1968），曾以「易海」一詞稱讚《易經》之極高明而道中庸之思想特質。二十世紀奧地利心理學家榮格（Carl Gustav Jung，1875-1961）爲德國漢學家尉理賢（Richard Wilhem，1873-1930）的《易經》德文譯本寫引言時，曾用「共時性原理」（principle of synchronicity）一詞，形容《易經》這部經典中所展現的思維方式。這種思維方式與西方的「因果律」（causality）正好相反，所強調的是事件之間的相互依存性，及其與觀察者主觀心理狀態之互動關係。吳偉明的論文告訴我們：雖然琉球學者並無闡釋《易經》的著作，但是與《易經》相關的陰陽五行說及卜筮對琉球民俗卻有很大影響，而且融入琉球本土文化，而被琉球人應用於風水、占卜、民間信仰、醫學及建築等不同領域。吳教授的這篇論文，不僅爲東亞儒學領域中的琉球儒學研究開啟一個新的視窗；也啟示我們：《易經》不僅是東亞文化與思想中的「大傳統」之核心經典，而且，在東亞庶民生活的「小傳統」中，也有其舉足輕重的影響力。這篇論文也從《易經》之東傳琉球之個案中，具體地說明：在東亞文化交流中，如《易經》這種經典文本之開放性極具關鍵性之地位。正是由於文本之開放性，所以，文本不僅可以召喚異域的知識菁英起而加以詮釋，也可以影響一般庶民大眾的日常生活。

本期專號另二篇論文作者王明兵教授，以日本近世朱子學大師藤原惺窩（1561-1619）為中心，探討藤原惺窩身處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葉東亞歷史巨變中的回應。王明兵分析藤原惺窩所提出的與明朝及朝鮮的外交對應策略，以主張日本應發展與安南之經貿關係。凡此種種主張，均顯示藤原惺窩的東亞世界觀，也顯示作為日本儒者的藤原惺窩的主體性。這篇論文在相當程度之內，也可以啟示我們：所謂「他者」（如明朝、朝鮮或安南），常常是透過觀察者（如藤原惺窩）的「自我」，而折射出來的「他者」形象，因此，在文化交流的「自我」與「他者」的互動之中，最關鍵的就是「自我」主體性之建立。東晉學者郭璞（276-324）《山海經·序》嘗云：「物不自異，待我而後異」，旨哉斯言！

本期專號第三篇論文作者李明璫教授分析臺灣人的認同論述中，「日本」這個概念或符號，如何被不同世代的臺灣居民所挪用，以作為想像或建構自我認同之重要基礎。這篇論文觸及東亞文化交流中，常見的重要概念（如「中國」或「日本」）之游移性與可被塑造性的現象。以東亞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「中國」這個概念為例，在古代中國經典中的「中國」這個詞稱，基本上是「文化認同」與「政治認同」合而為一的一個概念，但是，當「中國」個概念隨著儒家經典而東傳朝鮮與日本之後，它經歷了異域知識分子的挪用（appropriation）、創新（innovation）與比附等各種新詮釋，呈現異域人士之「政治認同」與「文化認同」之緊張性，十八世紀德川時代的日本學者甚至將「中國」一詞挪用來指稱「日本」。

李明璫的論文以「日本」這個概念／符號為中心，分析臺灣的「親日」年長者與「哈日」年輕人這兩個不同世代，對於理想化了的「日本」的想像與建構。這篇論文在當代中外學界有關臺灣認同問題的研究論著中，別樹一幟。過去相關研究多半聚焦在臺灣居民如何受到外來文化（如日本文化或戰後美國文化）的影響，這篇論文則化被動為主動，觀察臺灣的人如何主動建構被理想化了的「日本」形象。其次，這篇論文如果放在十九世紀以降各形各色的「日本人論」的論述脈絡中來看，也以臺灣人的「日本人論」為例，開啟了一個「日本人論」研究的新視窗。

總之，本期專號所刊三篇論文，都在不同程度之內，也在不同面向之間，闡釋了東亞交流中「文本的開放性」、「概念的游移性」與「人物的主體性」的特質。

The image shows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on a light-colored background. The characters are '黃後傑' (Huang Hou-jie), written in a cursive, calligraphic style.

《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》總編輯